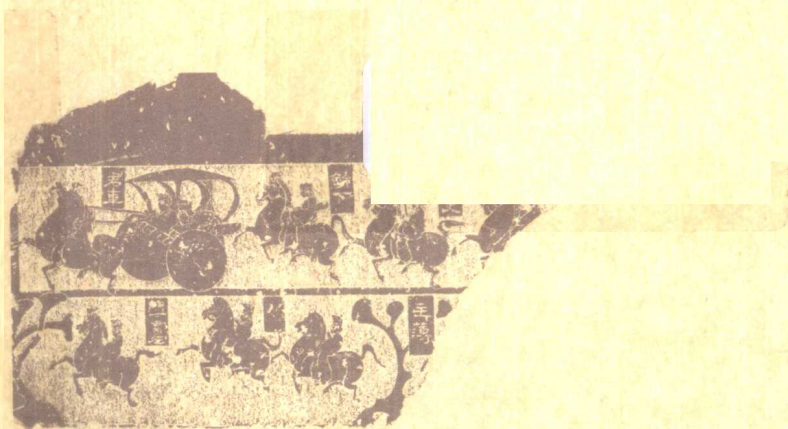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献学九讲

张舜徽 著

中国文献学九讲

张舜徽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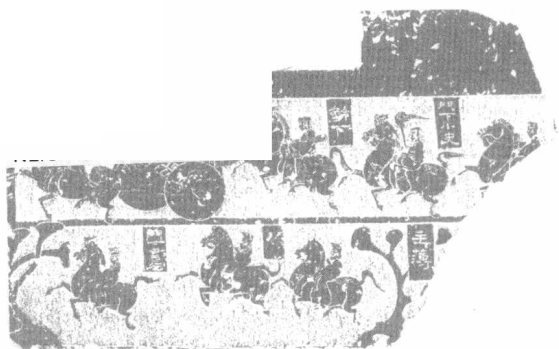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书局

ZHONGHUA BOOK COMPANY

中国文献学九讲

张舜徽 著



中华书局
ZHONGHUA BOOK COMPAN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献学九讲 / 张舜徽著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1.4

ISBN 978 - 7 - 101 - 07875 - 6

I. 中… II. 张… III. 文献学—中国 IV. G25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7190 号

书 名 中国文献学九讲

著 者 张舜徽

责任编辑 陈 虎 娄建勇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700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张 14½ 插页 2 字数 180 千字

印 数 1-6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7875 - 6

定 价 29.00 元

目 录

———— 1 — 22

第一讲 文献学概说

- 一 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/3
- 二 记录古代文献的材料/6
- 三 记录古代文献的书籍/12
- 四 古代文献的散亡(上)/14
- 五 古代文献的散亡(下)/18

———— 23 — 40

第二讲 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

- 一 著作、编述、抄纂三者的区别/25
- 二 编述的体例/27
- 三 写作的模仿/29
- 四 写作的伪托/32
- 五 写作的类辑/36

———— 41 — 64

第三讲 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之一:版本

- 一 何谓版本/43
- 二 雕版印书溯源/46
- 三 写本书/49
- 四 刻本源流/52

五 宋、金、元、明刻本不可尽据/56

六 精校本和精刊本/60

-----65---98

第四讲 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之二:校勘

一 校勘的起源和任务/67

二 校勘的意义/71

三 校书的条件/78

四 校书的依据/83

五 校书的态度/88

六 清朝人的校书工作/92

-----99---124

第五讲 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之三:目录

一 何谓目录/101

二 书目的部类/104

三 书目的流别:官簿/109

四 书目的流别:史志/114

五 书目的流别:私录/117

六 其他书目/120

-----125---150

第六讲 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

一 抄写/127

二 注解/130

三 翻译/134

四 考证/137

五 辨伪/141

六 辑佚/146

-----151 -- 178

第七讲 前人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

- 一 修通史/153
- 二 纂方志/157
- 三 绘地图/161
- 四 制图表/165
- 五 编字典/169
- 六 辑丛书/173

-----179 -- 208

第八讲 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

- 一 刘向、刘歆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/181
- 二 郑玄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/184
- 三 陆德明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/187
- 四 郑樵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/191
- 五 章学诚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/197
- 六 纪昀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/203

-----209 -- 223

第九讲 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

- 一 语言文字方面的整理/211
- 二 经传的注释与阐发/214
- 三 史实的考辨/217
- 四 周秦诸子的整理/221

-----中国文献学九讲-----

【第二讲】

文献学概说

一 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

文、献二字联成一词，出现在中国古书上，是从《论语》开始的。《论语·八佾》篇记载孔子的话：

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

汉、宋学者加注释时，都把“文”解为典籍；“献”解为贤人。过去学者所强调的“征文考献”，便是说要了解过去的历史，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，一方面探索于耆旧言论。言论的内容，自然包括世代相承的许多传说和文人学士的一些评议在内。本来，当我们祖先没有发明记载思想语言的工具以前，一切生活活动的事实，都靠口耳相传。这种口耳相传的材料，在古代便是史料。所以“古”字在《说文》中的解释是：“故也；从十口，识前言者也。”这字的构造，从十口，是十口相传的意思，是指它纵的联系——时间的联系来说的。这种世代相传的史实，都是从很早的祖先嘴里说出来的。我们当小孩时，喜听家里长辈人讲说高曾祖考故事，听母亲说的，不如听祖母说的那样详细而亲切有味。大约时代愈早的人，懂的旧事愈多，介绍得愈详尽。我们能够武断那些丰富的传说资料都不可靠吗？所以古人研究历史，都把传说看成了重要史料。言论的另一方面，便是对历史上人、事、物的评议和见解，可为后来治史的参考，价值也很高。过去学者们把古代的传说、言论和书本记载并重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用“文献”二字自名其著述，起于宋末元初的马端临。他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《文献通考》。《自叙》指出：

凡叙事，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，以及百家传记之书，信而

有证者从之，乖异传疑者不录，所谓文也。凡论事，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，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，以至名流之燕谈、稗官之记录，凡一话一言，可以订典故之得失、证史传之是非者，则采而录之，所谓献也。

这很明显地谈到他编写这部书的取材，不外两个来源：一是书本的记载，一是学士名流的议论。由于他是宋末宰相马廷鸾的儿子，给他在当时搜集史料、接纳名流，提供了有利条件。所以他的书中，甄录时人议论极多，连他父亲的话都采入了。我们试检这部三百四十八卷书的写作形式，充分体现了“文”和“献”相互依倚的作用。凡是顶格写的，都是书本记载；凡是低一格写的，都是名流贤者的议论；二者交相为用，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《文献通考》。

其实，我国史学界，将史实和言论并重，作为撰述的两大内容，这不是从马端临开始的。远在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，记叙之外，还收录了不少文辞、言论。到了班固，写成《汉书》，凡是有关学术、政治的重要论文，都一一载入传中。从此，历代诸史，也都沿用了这一体例。如果再推而上之，那么，《尚书》中的“典”，叙述事实；“谟”，记载言论。《左传》一书，于叙事之外，还用“君子曰”以抒发言论。由此可见，我国古代的历史书籍以“文”和“献”为主要内容，起源很早。不过取“文献”二字作为著述的标题，在马端临以前，却没有人用过。明成祖时，编《永乐大典》，初名《文献大成》，也取义于包含各类图书在内的意思。

“文献”既是一个旧名词，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。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，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。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、古物、模型、绘画，概称为历史文献，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，和“文献”二字的原意，是不相符合的。当然，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，如龟甲、金石上面的刻辞，竹简、缙帛上面的文字，便是古代的书籍，是研究、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，必须加以重视。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或牙齿，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；在某一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、铜器、漆器等实物，有必要考明其形制、时代和手工艺的发展情况，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。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，和文献学自然是有区别的。

我国古代,无所谓文献学,而有从事于研究、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,在过去称之为校讎学家。所以,校讎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。凡是有关整理、编纂、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,都由校讎学家担负了起来。假若没有历代校讎家们的辛勤劳动,尽管文献资料堆积成山,学者们也是无法去阅读、去探索的。我们今天,自然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讎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,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的图书、资料(包括甲骨、金石、竹简、帛书),进行整理、编纂、注释工作,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、系统化;古奥的文字通俗化、明朗化。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、条别源流、甄论得失,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,节省时间,在研究、整理历史文献方面,做出有益的贡献,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。

但是,这仅仅是此一工作的开端,而不是我们的落脚点;这仅仅是一种手段,而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。有人认为,努力从事研究、整理历史文献的工作,只是围绕着大量的故纸堆在兜圈子,没有多大出息。这种看法是错误的。只要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,为整理而整理,而是心怀大志,朝着一个宏伟目标而不懈努力,不仅大有出息,而且可以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。在中外古今著名学者中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凡是想在人类历史上做出总结性的工作,写出一部伟大著述的,都是穷年累月,从研究、整理历史文献着手,再结合实际调查考察,才能取得成功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、马克思写《资本论》,都这样做过。由于他们有雄伟的气魄、庞大的规模,为了要撰述一部总结性的巨著而努力奋斗,竟成为世界上整理历史文献最成功的人,替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,这是我们的绝好榜样。我们要有雄心壮志,沿着前人已经开创的道路前进!所以我们的最大目的,便是要在对文献进行整理、编纂、注释工作的基础上,去粗取精,删繁就简,创立新的体例,运用新的观点,编述为有系统、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、完整的《中华通史》,使全国人民得从这里看到悠久而丰富的全部文化,因之油然而生爱国之心,以激发其志气;而另一方面,有了这部书,可以节省人们求知的时间和精力;读了这部书,可以抵当若干部书;对帮助人们增广文化知识,有着更多的好处。这便是我们文献工作者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。

二 记录古代文献的材料

(一)甲骨

根据地下已经出土的材料,证明我国在商代,已有很多可用以记事的文字了。所记载的,只是极简单的某月某日做什么事,用小刀刻在龟板的腹甲和牛骨上。因为这上面的记载,大半是占卜的事情,所以学者们称它为“甲骨卜辞”,或称为“龟甲文字”。因为它出土于殷代都城旧址,所以又称为“殷虚卜辞”(虚即墟字),或称为“殷虚书契”(契是刻的意思)。这种遗物,埋藏在地下达三千年之久,直到 1899 年(清末光绪二十五年),才大批出土于现在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。在这以前,并非没有出过土,每当农民犁田的时候,是经常有些发现的,都被称为龙骨,以贱价卖给药店去了。到 1899 年,才被学者们发觉,加以重视和收购。所以叙述龟、骨出土的历史的,也就从这年说起。小屯村既是殷都旧址,这些出土的龟甲兽骨,无疑是殷代统治阶级藏书之府内的遗物。

最初发现甲骨上面有文字加以收购的,为山东福山人王懿荣。他是清末的官僚,住在北京,是一位金石收藏家。当他最先发现龟板上有文字时,便托古董商四处搜求,共约千片。不久,他死了,甲骨为丹徒刘铁云(鹗)所得。刘氏又托人奔走购买,所集更多。上虞罗振玉,在刘氏处开始看到甲骨文字,以为“汉以来小学家所不得见”,惊为奇货,因怂恿刘氏拓印行世。1903 年(光绪二十九年),刘氏择龟甲中字迹完好者千余片,拓印为书,名《铁云藏龟》,凡六册,这便是甲骨文字印行之始。这书印行不久,当时朴学大师瑞安孙诒让得而读之,在 1904 年,写成《契文举例》二卷,这便是我国学者从事于甲骨文字研究之始。次年,孙氏又刊行所著《名原》二卷,摭拾金石遗文与甲骨刻辞,证说古文字的形体,这便是我国学者用甲骨文考证古文字之始。

至于根据甲骨文字,以上证殷代史实,秩然就理,替近几十年来的史学界开辟一新途径,则以罗振玉、王国维二人之功为最多,而王氏之成就尤

巨。两人在政治上、思想感情上是封建的、反动的；但是在考史工作上所用的方法，是新进的、科学的。罗氏从 1906 年开始搜购甲骨，并派专人至安阳采掘，前后所得，达三万片以上，为历来收藏家所不及。于是开始了广为流传的工作。先后编印《殷虚书契》八卷、《殷虚书契菁华》一卷、《殷虚书契后编》二卷、《殷虚书契续编》六卷。这几部书的行世，对学术界的贡献极大，替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，由此研究甲骨文字的风气，也就大大地展开了。

不过前此殷虚甲骨的出土，纯属偶然的发现，及知其可以牟利，则又滥肆开采。在这中间，自然毁灭了不少宝贵的材料。至于正式组织人力，用科学方法，有计划地进行发掘，这是从 1928 年才开始的。由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其事，实际参加工作的如梁思永、李济、董作宾，都富有考古学的知识与经验，所以收获也很大。从 1928 年 10 月到 1934 年 3 月，陆续进行了九次发掘，共发现龟甲和兽骨六五一三片。选出三八六六片，编为《殷虚文字甲编》，由商务印书馆影印行世。1934 年的秋天，和 1935 年的春、秋两季，又继续举行了第十、十一、十二等三次发掘，仅找到了殷代帝王的葬所，而没有发现甲骨。从 1936 年春季到 1937 年春季，又进行了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等三次发掘，共发现龟、骨一八四〇五片，编为《殷虚文字乙编》，先后出版了上、中、下三辑。从此研究甲骨文字的材料，较过去私人所搜求而传拓的，更加丰富而完整。1955 年，又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成《殷虚文字缀合》，将断碎了的甲骨，联接起来，从而补充了许多资料。近年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，编出《甲骨文合集》，陆续出版，洋洋大观，集甲骨文字之大成。

(二)金石

古代有些重要的文献记录，为了传之久远，不致容易朽烂缺脱，于是托铜器和石碑上的刻辞以传于后世。金石文字，便成为考证古史的宝贵资料。特别是铜器较石刻更能耐久，可藉以考证古史的作用更大。铜器绝大部分，都是古代统治阶级日常生活中所享用的礼器。大概说来，乐器有钟，食器有鼎、鬲、敦、簠，饮器有尊、彝、壶、罍、爵、觚，盥洗器有盘、匜。这些礼

器中，以钟和鼎为最大，上面大半刻有文字，所以后来便称研究这类东西的学问为“钟鼎文字之学”，现在简称为“金文”。

从公元前十三四世纪起，古代统治阶级，便已在他们常用的青铜器上刻字。最初仅刻上自己的名字或其他符号以示区别。后来渐渐刻上带有纪念性的文字，或者说明作器的原因，或者说明作器的用途和作器的人。后又进一步，将需要永久保存的重要文献也刻在上面了。因此，青铜器上的文字，就由一个字、两个字逐渐发展到几百个字。我们从这些纪念性文辞上，可以得着关于当时许多事情的历史知识。这种青铜器上的文字，我们称之为“铭”，铭文也就起着书的作用。如毛公鼎、孟鼎、散氏盘、虢季子白盘、史墙盘之类的铭文都很长，是极其重要的古代文献。

刻文字在铜器上，比刻石艰难，加以文字也不能多载，所以到了秦以后，便普遍用石刻代金刻。南宋学者郑樵在《通志·金石略》中说过：“三代而上，惟勒鼎彝。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，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。自秦迄今，惟用石刻。”这自然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
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。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，各刻四言诗一首，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，因又称为“猎碣”。所刻书体，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大篆（即籀文），历代学者们对其书法评价很高。其制作时代，唐人以为周文王或宣王，宋人始提出秦始皇以前之说。经近代学者进一步研究，公认为秦国的刻石，但仍有文公、穆公、襄公、献公诸说，确切年代，尚不易定。石原在天兴县（今陕西宝鸡）之南，唐初被发现。杜甫、韦应物、韩愈等都有诗篇题咏，益为人们所重视。十石传到今天，文字大多剥泐，其中一石全部无存。原石今藏故宫博物院。

远在公元前 100 年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，便将秦始皇巡游天下、颂扬功德的刻石，如泰山、琅邪、芝罘、碣石等石刻上面的文辞，都收入了《秦始皇本纪》，这便开辟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途径。秦始皇刻石颂功之事，史凡六见。芝罘、碣石之刻，久已无传；峰山、会稽，皆出后人重摹；泰山石毁于火；琅邪台刻石，清咸、同间犹存，后亦坠于海。从汉以来，碑的应用愈广，而石刻愈多，取以考证史实，为用更大。石文价值，不在金文之下。后人考证旧史的，便以“金石”并称了。

在我国封建社会，统治阶级把几部重要的儒家经传刻在较厚的石版

上,作为统一的标准读本,是从东汉熹平三年(174)的石经开始的。当时汉灵帝吩咐蔡邕等写好上石。其所写内容,为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鲁诗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》五经及《公羊传》、《论语》。刻成后,竖立在洛阳太学(当时最高学府)门外,以便全国读书的人,都以此为依据,来校正传抄本的讹误。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称,当时“观视及摹写者,车乘日千余两,填塞街陌”。说明每天都有很多人去抄石经,或用捶拓的方法,揭取印本。后来,魏明帝正始年间(3世纪初),又用古文、篆、隶三种字体,刻了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二种,称为“三体石经”,每个字都用三种字体写成,比较烦难,没有多写其他经、传便中止了。唐文宗开成年间(9世纪中叶),也在长安太学用楷书书写刻了十二部儒家经传(《十三经》中无《孟子》)。这时,印刷术已发明了。不久以后,儒家经、传,使用雕刻木版的办法代替了雕刻石版,比较轻而易举,刷印方便。所以唐以后还有几个朝代都刻了石经,但意义和作用,都赶不上熹平石经和三体石经的重大。至于历代墓碑墓志的拓本,保存到今天的,数量很多,在在可以考证史传、增补遗闻,也是极可珍贵的文献资料。

(三)竹木

前面所谈到的古代文献资料——记录在甲骨、金石上面的文字,都不能算是正式的书籍。因为它们本身具有另外一种目的,而不是以抒发情感、记载史实、传布思想为职志的。石经虽是正式的书,但它们是在已经有了正式的书很久之后才出现的。谈到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,是那些用竹、木为材料而写出的文字记录。

古人用以写书的竹片,叫做“简”,也称为“策”。所以郑玄《仪礼注》、蔡邕《独断》中都说:“策,简也。”古人用以写书的木版,叫做“方”,也称为“牍”。《礼记·中庸》说过:“文武之道,布在方策。”古人说“方策”,就等于我们说“书籍”一样。制成竹简和木牍的方法,是先取竹、木裁成短段,剖析成片,再加刮削之功,成为长方形的写书版。由于新竹容易生虫朽烂,凡制竹简,必须先放在火上烘出水来,名为“汗青”;又将竹上青皮刮去,名为“杀青”。至于木版,更要用力刨治,使它平滑,才好在上面写字。

竹简的形式狭而长,一片竹简所载字数有限,因此,写成一部书,便要

用很多的简。为了便于阅读,这些简必须按着文字的次序编连起来,成为册。编简成册的方法是用一根带子,将简的上下编连起来,再把剩余的带头,将简捆扎成为一束,这就是一册书。编简用的带,有丝绳、皮带两种。丝质的叫“丝编”,牛皮的叫“韦编”。通常这样编成的一册,是书中一篇首尾完整的文字,所以又叫做“篇”。古人对于竹书的计数,都以篇为单位。

木牍的用途,主要是作为通信和书写短文。古人通信用木牍,它通常是一尺长,所以有“尺牍”之名。《仪礼·聘礼》说:“百名以上书于策,不及百名书于方。”“名”就是字,不及一百字的写在木版上;超过了一百字的,便要写在竹简上,使能编连起来,记载较多的内容。所以古代正式的书都用简策;至于版牍,原来只用作通信和记录短文,对竹简来说,自然还起了辅助作用。

简策的长度,在同一时期内是比较一致的。但在各个时期,则不相同。春秋战国时候的简,最长的二尺四寸,其次一尺二寸,又次八寸。汉朝的简,最长的二尺,其次一尺五寸,又次一尺,最小的五寸。古人用最长的简写经典,用短简写传记杂文,国家的法律是写在特长的三尺简上,表示尊重。每简的字无定数:最少的八字,多的有三十余字,通常在二十二字到二十五字之间。因此,一篇文章就会要用很多的简,而简也必须编连成册了。

这样的书,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从地下发现过。出土量最大的一次是280年,即西晋太康二年。《晋书·束皙传》称:“太康二年,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,……得竹书数十车。”这是多么丰富的文献资料!其中如《竹书纪年》、《穆天子传》,至今仍为古代史研究工作者所重视。后来历代都有或多或少的发现,不在这里胪列了。单就近十年来说:1972年4月,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四千四百余枚,其中大部分是兵书。除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臆兵法》以外,还发现《六韬》和《尉繚子》,也有《墨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以及不少有关军事、政治和阴阳杂占等方面的佚书。同年11月,甘肃武威县旱滩坡汉墓出土了医药简牍(省称医简)九十二枚,是一份很珍贵的医疗记录资料。除保存了比较完整的三十多个医方外,还记载了针灸穴位、刺疗禁忌等,内容极为丰富。1975年12月,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大量秦简,计有一千一百五十五枚。其内容大部分是法律、文书,不仅有秦律,而且有解释律文的问答和有关治狱的文书程序。反映了战国末年

到秦始皇时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各个方面的情况，为研究这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前所未见的丰富材料。单就这三次的出土简策来说，竟成批地出现了有关军事、医药、法律等方面的专门性文献资料，是十分值得重视的。

(四) 缣帛和纸

古人用竹木为材料来写书，感到太笨重；遇着长篇文字，简策就很多；搁着占地地方，携带很不便；弄乱了更不容易清理。而用丝织成的缣帛，质薄性柔，舒卷自如，用来写书，十分轻便。大约在竹简、木牍盛行的同时，便有帛书传布于世。《墨子·鲁问》篇已有“书于竹帛，镂于金石”的话，可知那时缣帛已经和竹木同是写书的材料了。

在竹、帛兼用的时代里，写字于素白的丝织品上，依着篇幅长短剪裁下来，折叠起，叫做“幡纸”。它的长短，依文字多少为转移。通常是卷成一束，称为一卷；短文也有几篇合成一卷的。而大部分的情况，在简策中编成一篇的，相当于帛书的一卷。所以古人计算书籍的数量时，很多的著录是“篇”、“卷”无分。

帛书的实物，七十多年前曾在新疆楼兰遗址发现过。1951年，也在长沙楚墓中发现过。但因丝织品在土中容易腐烂，所以发掘出来的帛书都是碎片，不能看见原来的形状，也无从辨识上面的文字。只有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，共约十二万字，包括《老子》、《经法》、《十大经》、《战国策》及兵书、历书、医书等十多种古籍，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的最完整、最丰富的古代帛书。即以《老子》而言，便有两种写本，大可取来校订今本《老子》的讹脱。其他也可作为整理古代文献的依据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、极其可贵的帛书大发现。

缣帛与纸，是相因的。纸的本义，原指缣帛。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说：

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，其用缣帛者谓之纸。缣贵而简重，并不便于人。伦乃造意，用树肤、麻头及敝布、鱼网以为纸。元兴元年（105）奏上之，帝善其能，自是莫不从用焉，故天下咸称“蔡侯纸”。

据此,可知远在汉代,“纸”是缣帛的别名。证之《说文》系部:“纸,絮一箔也”;竹部:“箔,漑絮簣也”;水部:“漑,于水中击絮也。”古人称“絮”,是指丝绵。联系起来看,可知我们祖先,很早就已经发明在水中捣碎丝绵,使成屑末,用细竹帘捞起,而造成纸的方法。《汉书·赵飞燕传》:“筐中有赫蹄书。”应劭云:“薄小纸也。”便是用丝绵造成的纸。大约将富于纤维质的材料,浸在水中,捣成泥浆,用竹帘取之,晒干便是纸,这是古人造纸的基本原理。蔡伦不过把材料推广到树皮、麻头、敝布、鱼网罢了。他对改进和推广造纸术,做出了贡献。如果把人工造纸术的出现,竟归功于蔡伦一人,那就错了。

自从利用有纤维质的废料来进行造纸以后,纸的生产量提高了,价钱又比缣帛低廉得多,服务面也大大推广,对于保存文献资料,传布学术思想,起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。所以纸的出现,是人类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。而发明这项重要材料的光荣,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劳动人民。世界各国先后知道造纸都是从中国传布出去的。这个经过改进、推广了的人工造纸术,在中国通行六百五十年后,传到了中亚;又经过四百年,传到欧洲;再经过五百八十年,才传到美国。现在全世界文化传布工作所依赖的这个主要材料——纸,就是这样由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贡献给全人类了。

三 记录古代文献的书籍

当我们祖先没有发明记载社会事物和思想语言的工具以前,一切生活活动的事实,都是从很早的古人口里传出来的。等到发明了文字,找到了记录文字的材料以后,才有可能将那些口耳相传的史实和现实生活中的经验,渐渐记录下来,于是出现了书籍。但为当时传布文字的方法与条件所限,不可能记录很多字。愈是材料粗糙、刻制艰难的条件下,所记录的文字便愈简略。证之甲骨、金文,莫不如此。到了使用简牍和缣帛的时代,便丰富多了。由少到多,由简单到复杂,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,书籍的发展,也自然不能例外。

古今人的写作,尽管浩如烟海,但从写作的内容性质来加区别,不外抒情、纪实、说理三大类。一个人对外界接触或内心活动,要如实地抒发出